

杨贞德 著

转向自我

近代中国政治思想
上的个人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转向自我

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

杨贞德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个人/杨贞德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0
ISBN 978-7-108-04151-7

I. ①转… II. ①杨…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
国—近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8126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扉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9.00元

感谢的话

本书得以以现有的面貌呈现，首先要感谢的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的林毓生先生。林先生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老师，目前已自系上退休。本书所指出“个人”论述的基本架构，其根源明显来自老师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藉思想—文化以解决（政治、社会等）问题”这一现象所作分析的启发。比较不明显的是，书中的讨论方式相当程度上也受益于老师关于韦伯（Max Weber）与博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讲述。对于韦伯与博兰尼的理解，不仅有助于自己当年面对关于史学特征和知识性质的困惑，而且有助于日后探索“脉络分析”与“论述分析”的研究取径。其次应该感谢的是当时同属历史系、教授西洋思想史，并担任我博士论文口试委员的 Laurence Dickey 先生。先生建议我在写作架构上参考“剑桥学派”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后自己才比较系统地阅读波科克（J. G. A. Pocock）。

书中各篇文章在撰写和出版期间，曾经得到多方的帮助。“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内不同学科交会的环境，不但丰富自己的知识，而且带来思想上的激荡。所内友人在问学、困学乃至生活上的相互扶持和砥砺，以及图书馆同人的热心相助，都是研究过程中无以衡量其价值的资源。书中除了第一和第三两章之外，各章的研究和写作曾分别获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补助。书稿匿名审查人的意见有助于在部分论点上作进一步的厘清。第一章导言部分，特别要感谢严志雄、罗久蓉和华玮在结构方面的建议，以及王远义、张福建、贺照田、张志强、胡晓真、余敏

玲和毛丹多位友人，在书名和内容上的相与讨论。这些年来，所内同人华玮（现任职香港中文大学）经常听我说些尚未成形的想法；杨晋龙总是不忘“忠诚反对”的积极作用，蒋秋华则不时要扮演中国文史辞典的角色；老友王远义和张福建辛苦阅读文章的初稿，是学习与辩论中西历史思想问题的绝佳伙伴。李豫宜同学协助检索和查核材料多年，并与詹景雯、郭颖瑄、刘柏宏、杨轩棻、吴晓昀几位同学，先后承担阅读和校对工作。文哲所负责出版的同人詹巧燕小姐与王福楨和陈彦颖两位先生，在书稿付梓过程中一起帮忙考虑从封面到字形安排等的细节。在此谨向这些机构、友人和工作同人深致谢忱。至于书中仍有的缺失当然还是来自于自己的不足，责无旁贷。

最后，最感谢的还是父亲和母亲。父亲和母亲疼爱子女，深信求知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即使是我那些听来似乎匪夷所思的想法或决定也总给以全心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持，这本书绝对无法完成。

三联版序言

记得刚上研究所的那一年，所里两位甚为大家推崇的老师分别在课上说起学期报告究竟要为谁而写。当时年纪较长的李定一老师以他特有的方式，毫不犹豫地指出：报告当然是为自己而写，不需考虑别人的看法。比较年轻的江金太老师则相对地强调：写报告必须考虑到他人，因为写出来的文字要让他人能够看懂。从此以后，不时想起两位老师的提醒，也经常忖度是否可能兼顾为自己和为读者而写的两方面要求。但尽管再如何斟酌，面对自己的文字，下笔之际和重阅时的感受，总有意外的落差！

此次承三联书店为本书出简体字版，再次阅读本书，对于书中的安排和内容，有些与当初出繁体字版时不尽相同的想法，虽然最后只作了文字的校对和内容上些许的变动。本书目前的安排预设了读者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变化过程，对于如何找出个中的重要议题及其于西方思想中的相关资源，都已经有所理解和主张。以这两项预设为前提，全书旨在邀请读者从“转向自我”这一视角，以深入分析历史中特定面相（更多于宏观叙述历史图景）的方式，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特征。

第一章说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转向自我”的现象——亦即：近代中国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把政治和社会问题，定位为文化和思想问题，再把文化和思想问题定性为“个人”的认识和态度上的问题，并以“个人”的转向自我（自我要求、自行改变）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或方案——以及这些现象的历史意义。第二章介绍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剑桥学派藉由“论述分析”了解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俾以指出本书书写方式的

背景，并作为其它研治近代中国思想史所采取方式的对照。相较于以归纳和厘清特定名词（例如“经济”、“自由”、“封建”等等）所具有意义的做法，“论述分析”由于将政治论述视为典范，不仅有助于说明特定名词在不同脉络下的内容和异同，也有助于看出不同名词或主张中的连结或延续。

第三、四、五章旨在厘清“转向自我”思维模式的基本形态。第三章以胡适所阐释的实验主义及其科学方法观为例，借着对比美国实验主义原有的面貌，衬托出胡适的科学方法观中“转向自我”思维模式的具体展现和特征。第四章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社会契约论谈起，寻绎梁启超晚清时期以自由为自治的主张，与其中“转向自我”的思维模式。第五章检视胡适的政论；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转向自我”思维模式的典型人物，虽然曾有改变的迹象，却始终只是坚守这一取径。最后，“转向自我”的思维模式虽然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可溯源至传统中国，却并不意涵着文化决定论；这一思维模式既能与其它的思潮合流，也能与其它的取向或行动结合。循此，第六至第八章乃就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人，说明他们如何各以自己的方式，融合“转向自我”的思维模式与晚清即已吸引不同背景的中国读书人的天演进化论；而陈独秀与梁漱溟在感受到“转向自我”的改革方式有所不足时，另且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分别投入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

对于方始进入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或者比较习于以叙事方式探索历史的读者，依循前述章节的安排阅读本书，很可能会觉得书中的讨论处处显得隔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试从第五和第六章读起。这两章都以胡适的思想为主题，并且依照时间先后说明他的考虑和其间的变化。当作故事来看，第五章的内容相当单纯，只是说明胡适曾经做过什么和说过什么，以及他的作为中“转向自我”思维模式出现的样貌。相较之下，第六章同样讲述胡适的故事，但内容稍微复杂些。故事的主轴不仅有“转向自我”的思维模式，也有这一思维模式会同进化论述，在胡适所撰述中国文

学、哲学史，与中国文化性质中的体现；故事的背景则加入严复的进化史观，藉以烘托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论述内部的一些变化。接续的第七、第八两章，同样可以归属为依时间序列排比的故事。第七章阐述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之前的爱国主张及其变化过程，除了从中理出陈独秀思想上“转向自我”的特征之外，并亦指明新文化运动的几项思想特色。第八章探索梁漱溟的思想演变，特别是他对于人心及其自我要求的重视，以及对于中国传统的肯定方式。为了彰显梁漱溟所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特色，本章并纳入关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的一段重要说明，用以彰显梁漱溟将中国历史和文化区分为二的立场。

读完第五至第八章，若是先转往第四章梁启超的自由与自治观，将会更容易进入其它章节的讨论。第四章还是依照时间的先后安排，并如同第八章般纳入一小段西方思想作为讨论的楔子。但是，文中不再如同前述几章般回顾梁启超长期的看法，而是改用比较抽象的分析，辨识梁启超晚清阶段所述不同自由理念的内容和意涵。有了第四章为基础，阅读第三章相对地容易许多。第三章以思想内在理路（而非时间前后）为架构，平行比较胡适和美国实验主义的科学观；从中将可以看出胡适如何以“转向自我”的思维模式，理解实际上蕴涵不同重点的实验主义。这种思维模式是胡适看待人文世界的一贯方法，而不只是他对于特定事件的立场或一时的倾向。

阅读第三至第八章后，再看综论性的第一章。及至于此，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特征，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也比较清楚本书所述“转向自我”的思维模式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和书中以相关西方思想作为参照的表述形式。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性地从“转向自我”的思维模式探索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内容与特性，将更容易把握它作为政治语言的性质与作用，以及它与传统“修身”理念之间的高度亲近性。遵循这样的方式读完第一章，第二章关于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剑桥学派的说明，也就留到了最后。这时，除了关注本书

用以比较严谨地考虑和组织近代中国各种“转向自我”现象的方法之外，也可留意其中所意涵“历史”在个人思维中不可或缺与不容忽视的地位。

在此或可稍加补充的是，无论哪一种读法，本书期能展现的最终目的皆是：在古今中西思想交织的脉络中，经由穿梭出入近代中国历史的视野，一方面具体熟悉近代中国思想中相关于“新民”、“天演”、“自由”与“自治”等语词及其相关问题，以及历史人物思索这些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从比较普世性的人的角度，看待“个人”和“历史”的相互关系。本书所讨论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站在“希望”的一方，极为重视并肯定个人作为形塑与带动历史的动力；书中的研究方法和意旨，则相对地强调“记忆”的重要性，指出人在历史中成长、思考和行动，必须能够从中有所学习与反省。个人有时是历史的动力，有时是承载历史的客体。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个人，只能根据所在的时空条件，剖析实际的问题，并在“希望”和“记忆”之间审慎地斟酌。

最后，在此特别要谢谢三联书店的编辑冯金红女史、中国人民大学于春松教授，以及分别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与文学所的张志强和贺照田两位老友。今年（2012年）4月在北京和先生们关于本书和近代中国思想研究的谈话，不但促成了这篇短序，也使得笔者更深一层领会个人、历史与希望之间相因相扣的环节。

杨贞德

2012年6月

目 录

感谢的话

三联版序言

第一章	导言：个人、自由、自治与历史	1
第二章	从论述看历史：波科克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39
第三章	转向自我：胡适科学方法观的特征	66
第四章	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	89
第五章	自由与修身：胡适自由主义中的思维模式	113
第六章	自由与进化：胡适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与历史	146
第七章	自由的取舍：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之路	204
第八章	人心与历史：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中的进化论述	268

附记 312

征引书目 314

译名对照表 344

第一章

导言：个人、自由、自治与历史

本书收入笔者多年来为探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个人”的意义^①，先后撰成的论文。书名定为“转向自我”，主要由于近代中国政治思考中清楚地呈现了一个吁求个人转向自我、自我改造的共同倾向^②。简单地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本解答时，往往从政治社会领域转向个人，特别强调“根柢在人”、强调个人的思想和态度在其中的重要性。他们深信救国之道在于“新民”、在于造就能接受新知和实践公德的新人。不仅如此，他们的新民和新人主张，以“说服”个人、促使个人自我改造，作为主要造就个人的方式，并且往往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针对政治权力所提出的“自治”理念，解释成以个人内在智识和德行上的“自治”为要件或内涵的追求。

正是这一“转向自我”的取向与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和进化史观相结合，共同构筑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个人”论述（discourse）的基本形

① “近代中国”一词在本书中指称的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② 此间“转向自我”的意义有时也可以用“反求诸己”一词表达。本书之所以不援用“反求诸己”，而另取“转向自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反求诸己”在传统中国政治论述中已有其丰富意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曾论及这一名词和相关问题，却不是有意识地继承、反省或发展这一论述及其意涵。二是：以“转向自我”一词所描述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虽然与“反求诸己”一词有很大的亲近性（affinities），彼此的内容和意义却不是可以完全互相涵盖的，其间异同值得更深入地注意与分梳。以“反求诸己”一词说明近代中国思想上重要面相之例，见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1895—1905）》，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页315—351。

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藉由晚清以降广为流行的“新民”和“天演”两种政治论述，阐述个人、自由、自治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并据以说明当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性质与解答。他们注重个人的特质和角色、自由的内涵和影响，以及历史的积淀和前景；宣称个人自由是世界进化的方向与动力，是近代西方之所以兴盛的基础，也是中国现有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根据这一“个人”论述，中国的“个人”自古丧失自由，而今更沦为“奴隶”、“多重奴隶”，乃至“奴隶之奴隶，以献媚于奴隶”^①；打破当前困境的首要工作，就在于个人的自我觉醒与唤醒众人，期使人我都能经由追求一己的自由和自治（亦即“新民”），与把握人类历史进化的方向（亦即“天演”），将国家带往富强与文明的双重理想境地。^②

一 “个人”论述的基本构成

为能清楚说明上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个人”的观察和期许，本书采取了思想史的进路，特别是思想史研究中强调论述和语言分析的方式。这一着重论述和语言的进路，参考了西洋思想史家波科克（J. G. A. Pocock）所阐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径（详见本书第二章），但是它的根本要义仍在于细读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本，藉以寻绎其中“个人”论述的基本构成与意涵。

① 这些说辞见林炳：《责水师学生张兆宣书》，收入章士钊：《章士钊全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1：10。另如邹容曾说：“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谄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见氏著：《革命军》，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357，358。关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奴隶”说，参见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3.4（2002年12月）：694—700。

② 本书之所以采用“个人”、“自由”、“自治”和“历史”，而不直接引用“新民”与“天演”等名词，主要因为尽管诸多知识分子运用相同或相似于“新民”和“天演”的看法，他们未必援用这两个名词；运用“个人”与“历史”这些涵盖性比较宽广的理念，将能把更多知识分子（或者个别知识分子于不同时期）的看法纳入考虑，并据以进行中外和古今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

（一）政治论述的意义

波科克主张政治思想史是“政治论述的历史”，藉此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政治论述（或称为政治语言，以下不赘）的重要性。从历史的角度意指把文本放回作者所在的脉络（context），探究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与他所在、所从出脉络（或背景）之间的互动。论述分析则意味着以论述为分析的对象，并且在思想所从出的历史情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等不同脉络——中，特别着重语言的（linguistic）渊源。

波科克所强调的政治论述，意指能为不同作者运用的文字和表述形式。凡此文字和表述形式涉及但不局限于个别字词的定義，而是“可以被确认、有其内在连贯性，可以‘学得’也可以与其它语言区分的说话或书写方式”。其功能有如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所阐述的科学典范（或译为“范式”），亦即：在理解现象和思考问题时，规范拟探讨现象与问题的范围和方法，决定各项信息的相关性，以及定义个别议题的内容、价值和权威所在。人们经由这些论述，学习、表述和探讨特定的问题，或者创造性地把它们带往新的方向开展。经由分析政治论述，因此将可以看出文本作者在既有论述中的取舍和运用方式，与因此对于既有和新兴论述的影响，以及看出个别论述在不同作者笔下的面貌和经历的变化。

分析政治论述的目的，在于依据论述中构成分子彼此间的逻辑关系和历史关系，找出或重建个别理念所在的网络，并藉以理解和看出这一概念的种种意涵。个中实际操作的过程约可归结为下列三步骤：（一）广泛地阅读和掌握史料，俾以学习并熟悉文本所从出时代及其前后得见的政治和非政治性论述；（二）以活泼的想象力和敏锐而严谨的分析力，不断找出论述中未必明示的意涵（implications）和可能发展的方向与方式；（三）藉由上述理解和分析，预估不同作者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运用论述的可能方式，并且据以提出假设，再以史料验证该论述在文本中出现的实际面貌和

状况，甚至明确指出该论述正在变化的那一刹那、那一句话。个别的研究者对于拟分析的论述、文本及其脉络的切实把握，乃是实行这一研究方式的要件；愈是熟悉相关议题可能使用的具体的论述、拟探究的文本和其中的不同论述，以及这些文本与论述所从出的其它（包含思想和非思想性）历史脉络和情境，也就愈能看出不同知识分子和不同文本间的别异与相互关系，个人思想或时代思潮中先后不同的变化，不同时代的思想特征、转变和重要问题。就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它尤其有利于分梳激烈变动过程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延续与断裂，本土与外来之间的承接或改造，以及这些延续、断裂、承接与改造现象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自由、自治与历史

如果试从上述论述分析的立场，寻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上的重要内容，则其中个人论述的特征约而言之即是：以快速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为背景，由中国传统和外来思潮交织而成的如下几项原则：（一）追求个人自由与宣扬自由的理念；（二）以自我改造为根本方略；（三）视个人为历史进化的动力；（四）缺乏以保障个人为优先的要求，缺乏促进当权者自我改造的有效机制；（五）以国民教育作为因应政治问题的基本方式。

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个人自由是近代西方得以建设富强而文明国家的关键，也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亟须的要素。他们不但将西方的个人自由（乃至西方历史与社会的发展），溯源至西方思想家对于自由的重视和阐释^①，并且将介绍和推行“自由”理念视为自身无可推诿的责

^① 例如，邹容的《革命军》有言：“夫鲁索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邹容：《革命军》，页335）

任，自我期许以明白易懂而撼动人心的文字和语言^①——其内容包含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对于个人的钳制，与积极倡导以体现个人自由为要义的立宪政体——促使个人经由认识和实践真正的自由^②，成为改变现状的动力和建设国家的基础。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立场，清楚反映出林毓生所阐述、根源于中国传统思维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政治、社会等）问题的途径”（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③。根据林毓生的说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深信社会文化和个人思想是决定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根本要件，因此也是改造政治和社会的关键。在他们心中，这般对于文化和思想的信念预设了人心的活力与动力，亦即：（一）人心在影响和控制事物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有效性^④；（二）人心在面对真理时将会为其所动，乃至把握并追求其实现；（三）改变人心最根本和有效的方式，在于以真理直接

① 这些智识和德行所要求的不只是精神，也包含身体上的变化。不过，无论是变化精神或变化身体的主张，同样都以诉诸个人自发地改变自我为起始。

② 用《民报》上的话说，也就是“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去其实行也近”（孙文：《发刊词》，《民报》1〔1905年11月〕：3；影印版〔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辑委员会，1983年〕，1：11）。

③ 关于这一途径的意义、相关预设，及其于近代中国思想上的展现和意涵，详见 Yü-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Fourth Era*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chap.2; 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页147—151。其它相关研究，例见：Jerome A. Grieder, “The Question of ‘Politics’ in the May Fourth Era,” in Benjamin I. 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95—101; 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页171—200。另有从思想上的唯意志论、国民性议题、近代个人主义的特征、以人治反人治的困境，以及相关思想可能的日本根源等等不同理路进行的研究，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高瑞泉：《从龚自珍到“战国策”派——略论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收入高瑞泉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6年），页167—223；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1993）：138—156；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s.2–3; 李晓东：《立宪政治与国民资格——免克彦对〈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影响》，《二十一世纪》98（2006年12月）：47—57。

④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pp.41, 54–55.

诉诸人心。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回答如何改变社会文化和个人思想时，采取了一种以个人为单位的个人主义式改造方略^①：他们以为改变文化和思想的办法，在于改变个人的主张与态度；改变个人的主张与态度，其根本方式又在于从个人着手，以人心为诉求的对象，以自我改造（而非经由外在于人心的法律、制度或经济力所带动的改造）为最有效、最可靠的改变途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思维方式，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将改造政治和社会的要求，转成为对于个人智识和德行上自我改造的要求——要求个人自立自强，对于既有的弊端及其成因有所觉悟，并接受和力行“自由”等等新知与相关的德行。用梁启超的话说，亦即：

今世之言独立者，或曰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或曰脱满州之羁轭而独立。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危哉微哉，独立之在我国乎！（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就其根源而言，梁启超（1873—1929）等人的做法与中国传统的“修身”（或“修己”）论述有其亲近性。刘师培（1884—1919）曾明白而直接地将“自治”一词与修身相联系，宣称“修身者，所以自治其身”。他说：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弗从；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是则正身之事乃古代圣贤所最崇。惟正身乃能正人，

① 此处“个人主义”一词旨在彰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向自我”这一立场在改变世界上所采取的方法。其中并不意涵个人具有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权利，或者个人生存的意义在于表达一己的独特性，也不意涵社会系由截然独立的个人所构成，必须以探究个别个体作为理解社会的根本或起点。

惟正身乃能处社会，故欲行社会伦理，亦必自正身始也。^①

另若就其近代特征而言，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带有“修身”论述色彩、以成就新民和新人为要旨的个人主义式方略，更在结合近代西方自由民主理念中人民自治的主张后，形塑了中国新兴“国民”自治论述的内容，亦即：传统中国对于读书人个人自治（修身修己）的要求，这时透过近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上人民自治（政治自决）要求的折射，转成为近代中国对于国民自治（培养公、私德）的要求。^②这三种不同的“自治”论述，由于共同使用“自治”一词，滑润了彼此转接的过程，乃至模糊掉其间从传统到近代之间应有的断裂和实际上的延续。应有的断裂意指国家由人民自治和个人的修己自治两者间，本有分别针对外在政治权力和针对个人自身用力的不同^③；但是，这一不同在近代国民（伦理）自治的要求背后，显得扑朔迷离；自由民主的人民自治中所具有的限制政治权力和保障个人的意涵，尤其未能获得应有的注意。实际上的延续则指：国民（伦理）自治的主张，和传统要求当权者和政治菁英个人自治的取径，蕴涵了同样面对政治的方式。然而，这一延续却因为国民自治论述带有“来自西方”的形式和面貌，以及国民道德中新而具体的要求，很容易就被忽视。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倡导以个人自治为基础的自由和独立，并辅之以历史进化的乐观信念，深信自由民主是历史进化的胜利与未来，历史进化的动力在于自由和独立的个人。他们运用这时获知的达尔文（Charles

① 刘师培：《伦理教科书》（页6，33），《刘师培全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4：126。关于“修身”论述在近代中国的意义，亦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页133—159。

② 此间思想上的具体转化过程，详见本书第三章关于梁启超思想的说明。关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与“修身”论述之联系，参见第二、第四章关于胡适政治观的讨论。

③ 严复曾论及西方“自由”理念与中国的“恕”与“絜矩”的不同（氏著：《论世变之亟》，王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但日后仍显得更为强调“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氏著：《原强修订稿》，前掲书，1：27）